

19世纪澳洲华人研究中女性史的缺失与重构

王 敏

(西南大学 新闻传媒学院, 重庆 400715)

[关键词] 澳洲; 华侨华人; 女性史; 白人种族主义; 男性中心主义; 跨种族交往

[摘要] 澳洲传统学术界对于19世纪澳洲华人史的研究, 大多基于白人种族主义立场, 呈现出单向度、类型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论文指出,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以及大量民间史料的发掘, 逐渐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更具包容性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路径。女性史视角的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 重视对女性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个人生命体验的真实再现, 打破了以往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刻板成见, 拓宽了对于华人婚姻形态、家族谱系、社区建构、文化融入等的研究。研究认为, 在19世纪澳洲华人生活中, 华人女性与白人女性都通过各种方式, 在华人社区建构以及与白人社区交往中, 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从而成为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图分类号] D634.3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8) 03-0022-0008

The Lack and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History in Chinese Australian Studies in the 19th Century

WANG Mi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Key words: Australia; Chinese overseas; female history; white racism; male centralism;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research on Australian Chinese history was mostly based on the standpoint of white racism, which therefore demonstrated one-dimensional, stereotyped and west-centered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ince 1950s, along with abandoning of “white Australia” policy, Australian scholars has started to introspect the previous research standpoints. Furthermore, due to the exploration of rich folk historical materials, more approach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is area, especially the prospective of female history which pays much attention to the daily life,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s of women and could lea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versified historical narratives to change the bias on Chinese community of 19th Century Australia.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Chinese women and white women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es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 thus they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is history.

1861年, 在悉尼郊外的“华人村”棚户区(Bark Huts), 21岁的白人女孩伊丽莎·戴维斯(Eliza Davis)的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这一事件引发澳洲殖民当局召开质询会, 因为孩子的父亲迪克(Dick)是一位中国劳工。包括《帝国报》(the Empire)在内的多家悉尼报纸对此进行了追踪报道,

[收稿日期] 2018-04-18; [修回日期] 2018-07-30

[作者简介] 王敏(1975—), 女,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方向为澳大利亚华人移民与传媒史。

还去伊丽莎家里进行了实地调查,在报道中详尽描绘了这个非婚同居家庭的赤贫,以及迪克“脸色苍白,面容憔悴消瘦,衣服打满补丁”——当时澳洲媒体上典型的华人男性形象,宗教和道德极度贫乏,整个树皮小屋村都充满了污秽、邪恶。^①伊丽莎的故事迅速被类型化为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交往会带来贫穷与堕落的悲惨故事。

这种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叙事贯穿于传统基于白人种族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立场的历史研究中,将19世纪澳洲华人史书写成没有家庭的男性的历史。这些研究基本上忽视了华人女性群体的存在,同时也污名化了那些与华人男性建立亲密关系的其他族裔女性,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关于19世纪澳洲华人史的单向度的分析框架和巨大的信息真空。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白澳政策”的废除,澳洲学术界开始有意识地反思以往的研究立场。同时,基于大量民间史料的发掘,逐渐形成自下而上的、更具包容性和批判精神的研究视角。其中,女性史视角的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重视对女性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个人生命体验的真实再现,把女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考察她们与男性移民、家族、国家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她们对于19世纪澳洲华人社区的重要性,将女性真正纳入到澳洲华人史的研究范畴,从而有助于改变传统对于澳洲华人的刻板成见,构建多元化的、两性共同参与的历史叙事。

一、19世纪澳洲殖民地的“华人问题”及其对华人史研究的影响

华人与澳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19世纪早期,已有华工零星由香港、新加坡等处抵达澳洲,从事农牧业与垦殖。^[1]1818年,广东人约翰·世英(John Sheying)以自由移民身份来澳,1821年获得30英亩土地,他被认为是确切记载的第一位在澳拥有土地的华人。^②1852年,英国殖民当局公布了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等地发现金矿的消息,来自欧洲、美国、中国等地的淘金者开始蜂拥而至。1855—1856年到达澳洲的华人多达27,272人。^[2]大多数华人淘金者来自香港和广东。

(一) 殖民地华人严重性别失衡与“华人问题”的产生

随着华人的大批到来,“华人问题”(Chinese Question)开始在澳洲殖民地浮现出来,其最直接因是来澳华人性别的严重失衡。19世纪50年代的华人淘金工和乡村雇工全是男性。据当时的人口统计,1861年,在新南威尔士约有1.3万名华人男性和2名华人女性,在维多利亚大约有2.5万名华人男性和8名华人女性,^[3]从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单身汉社会”(bachelor societies)。^[4]很难确切统计这些华人男性的婚姻状况,据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估计,约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华人男性已婚。^[5]1868年,牧师杨(J. W. Young)所做的一份报告称,维多利亚殖民地1.8万名华人男性中,大约有8000名在中国有妻子,^[6]也即保罗·苏(Paul C. P. Siu)所说的“已婚单身汉”(married bachelor)。^[7]淘金热带来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华人男性入澳,加剧了澳洲殖民地本已严重的性别失衡。

在当时澳洲白人的观念中,大量单身男性聚集是危险的。由于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华人男性被认为与大量的道德失范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相关联,包括强奸、性侵、同性恋、恋童癖、嫖娼、赌博、酗酒、抽鸦片以及精神错乱等,严重影响到澳洲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8]同时期的报纸上,开始大量刊登针对华人的尖锐批评。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澳洲殖民地议会和媒体都在不断讨

① 关于此事当时有多家媒体报道,参见: *Sydney Morning Herald* (SMH), 27 May 1861; *the Empire* (Sydney), 30 May 1861; *Sydney Mail*, 1 June 1861; *Goulburn Herald*, 1 June 1861; *Maitland Mercury*, 4 June 1861; *Courier* (Brisbane), 7 June 1861。

② 2018年澳大利亚各地举办“华人居澳200周年”纪念活动,认定约翰·世英(亦称“麦世英”)为第一位有确切文字记载的居澳华人。参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报道: <http://www.abc.net.au/chinese/2018-05-19/chinese-museum-chairman-bill-ou/9772046>; 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SBS)2018年6月24日节目采访Swinburne大学客座教授刘路新博士,亦提及麦世英及其来澳经历: <https://www.sbs.com.au/yourlanguage/mandarin/zh-hans/audiotrack/huan-le-kong-jian-ding-ju-ao-da-li-ya-200zhou-nian-hua-ren-yao-bu-yao-dan-xin-zai-shou?language=zh-hans>。

论如何解决华人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然而，鼓励华人妇女入澳并没有得到殖民地主流社会的认可，因为担心会在澳洲迅速繁衍出庞大的中国人口，数量足以压倒欧洲白人。同时，基于澳洲殖民地白人社会普遍对华人的厌恶和偏见，也不认可异族婚姻是华人性别失衡问题的解决之道。1901 年，澳大利亚联邦正式成立，推行种族主义的“白澳政策”，出台《限制移民法案》，全面禁止华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进入澳大利亚，这可以说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对“华人问题”所形成的既定观念驱使的结果。

表 1 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整个澳洲殖民地华人男性与女性人口统计数量（1861—1901）

年份	新南威尔士			维多利亚			澳洲殖民地		
	男性	女性	总人口	男性	女性	总人口	男性	女性	总人口
1861	12986	2	12988	24724	8	24732	—	—	—
1871	7208	12	7220	17795	31	17826	—	—	—
1881	10141	64	10205	11795	164	11959	38274	259	38533
1891	13048	109	13157	8355	134	8489	35523	298	35821
1901	10063	159	10222	6236	111	6347	29153	474	29627

资料来源：Charles H. Wickens, *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o. 18, 1925, Melbourne: Government Printer, 1925.

（二）“白人男性中心主义”框架下传统澳洲华人史研究的局限

二战以前，澳大利亚史学界已有研究在澳华人的著述问世，主要以研究殖民地时期、尤其是淘金热中的华人为主体。不过，早期的研究大多基于白人种族主义立场，围绕“华人问题”展开，呈现出单向度、类型化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对澳洲华人恶意中伤，竭力散布“黄祸论”，为“白澳政策”辩护。在史料运用上主要局限于英文史料，包括殖民地时期的政府报告、人口统计数据、移民档案、入籍记录、法庭记录、警察记录，以及大都市报纸、杂志和排华集会记录等其他出版物。这些文献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白人男性，受制于当时的整体社会环境或者“19 世纪思维”（nineteenth-century thinking），本身就充满了殖民主义偏见。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材料以及进行表面化的解读，对于“华人问题”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偏见的引导，形成关于华人家庭生活的刻板成见，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华人社区中的女性群体的存在及其价值。

以往，华人女性只是偶尔作为妓女、被抛弃的妻子等被提及，或作为一个稀奇的现象而被报道，比如，1869 年《悉尼先驱晨报》等以猎奇的口吻，报道了新南威尔士布雷德伍德（Braidwood）金矿区一个华人新娘到来的消息。^[9] 艾瑞克·罗斯在《澳大利亚华人史（1800—1888）》中也好奇地提及 1875 年 5 月一个华人贵妇来到库克城的事件，“她的到来吸引了大量欧洲人的注视，他们都渴望看到她的小脚、涂彩的嘴唇、眼睫毛、佩戴的高贵头饰以及身边的丫环”。^[10] 然而关于这个华人贵妇的身份、家庭、生活状态等却没有任何具体信息。麦克·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认为以往研究中存在着对华人女性巨大的认知鸿沟。^[11] 还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传统研究中的父权制视角（patriarchal perspectives），导致华人女性长期被忽视。当然，华人女性数量的稀少以及史料难以寻觅，也是研究缺失的重要因素。

二、女性史视角及其研究路径

1966 年，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白澳政策”，推行种族平等的多元文化政策。1972 年，

中澳关系实现正常化。整体社会环境的改变,促使澳洲学术界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研究华人移民史的热潮,并出现了包括女性史、社区史、家族史等特色鲜明的研究视角。

(一) 研究立场的转向与新史料的发掘

首先,更多学者开始介入澳洲华人史研究。尤其是一些华裔学者,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考察澳洲华人社会的政治组织、经济团体、文化生活等。同时,也有一些与华人并无血缘关联的澳洲学者,纯粹基于个人经历或学术志趣,介入了这一领域研究。这些学者总体上理解华人移民的困境,肯定华人对澳洲社会发展的重要贡献,认为长期以来对 19 世纪澳洲华人生活的解读,并不是基于华人自身的生命体验,存在着大量的缺失和误读,因此试图通过对华人生活史资料的深入挖掘,呈现真实的华人生活,改变以往研究中将华人群体边缘化、污名化的状况,有意识地反思以往研究中的种族歧视和男权主义倾向,或者称之为单一的“央格鲁—撒克逊”男性精英主义框架,力图建构多元化的历史叙事。

其次,大量社会史资料尤其是中文史料的发掘,也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立场转向,包括澳洲华人庙宇记录、商业信息、家族文献等;在澳商会、领事馆、同乡会等华人机构记录;华人社区、华人后裔访谈、调查等构成的口述史资料;照片、图绘、信件、日记、自传、私人文件等中英文个人资料,以及考古、物质文化、历史景观资料等。此外,大量曾经散落各地的乡村报纸、社区报纸、家族报纸,尤其是澳洲中文报纸,被数字化处理后开放给公众,也成为研究 19 世纪澳洲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打破了以往以官方英文史料为主的研究局限,不仅使得以往被认为“人数少得不值得研究”的华人女性群体及其研究价值开始浮现,同时,与华人结合的其他族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也被研究者所关注。新一轮研究中活跃的学者凯特·巴格纳尔(Kate Bagnall)等认为,女性在 19 世纪澳洲华人生活中并不是缺席的,华人女性与白人女性都通过各种方式,在华人社区建构以及与白人社区交往中,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这段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二) 女性史视角下的女性形象呈现

女性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后期的西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层次逐渐推进的研究路径:首先是在历史中发现女性、关注女性,以女性群体为研究对象;进而,从性别尤其是以往被忽视的女性视角解读整个历史,并尝试以两性平等立场重新建构历史;最终,女性史研究逐渐融入主流,性别与阶级、地域、族群等共同成为历史分析工具,从而使史学呈现纷繁多元的面貌。^[12]在 19 世纪澳洲华人研究中,女性史视角的引入和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融会,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相关历史资料,形成对以往男性主导的历史叙事的纠偏,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殖民地时期华人真实的家庭、社会和文化生活,揭示跨种族交往的常态化存在。

1. 华人女性

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华人女性这一“不可见”(invisible)的群体开始逐渐浮现出来。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莫拉格·洛赫(Morag Loh)和克里斯蒂娜·拉姆齐(Christine Ramsay)开创性地访谈了 33 个历史悠久的澳洲华人家族,推出“生存和庆典”(Survival and Celebration)摄影展览和相关论著,回顾了华人在澳洲定居最初 100 年的历程,尤其突出了对华人女性的关注。^[13]历史学家巴里·麦高文(Barry McGowan)和人类学家林德西·史密斯(Lindsay Smith)通过对金矿区布雷德伍德博物馆以及当地社区资料的深入挖掘,揭示了 19 世纪金矿区华人家庭以及女性的日常生活;^[14]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大量运用了自传性质的文献,生动再现了华人的家庭生活、婚姻状况、旅行、悉尼唐人街生存状况等;^[15]库奇曼(Couchman)追溯了墨尔本唐人街少数有史料记录的女性生活;^[16]克莱尔·赖特(Clare Wright)描写了金矿区的女性生活,认为金矿区尽管由男性主导,但女性也并非完全缺席;^[17]巴格纳尔通过对一个华人女性金·林恩(Kim Linn)命运史的细致梳理,具象地呈现出金矿区的女性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等。金是 1871 年在新南威尔士登记在册的 12 个华人女性之一,当时新南威尔士的华人男女性别比约为 600:1。^[18]金的丈夫阿豪(Ah How)于 1857 年来到澳洲,19 世

纪6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洁白可林（Jembaicumbene）金矿开商店、酒馆，逐渐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领袖人物。阿豪并非金矿区唯一一个有女性伴侣的华人，他身边的部分华人同伴选择与白人女性结合。金与阿豪的社交圈同时包含了华人和欧洲人，生育、医疗、庆典、工作、经商等日常活动，自然而然地带来了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比如由于当时金矿区医疗条件很差，金的头两个孩子是由白人女邻居帮忙接生，全都不幸夭折，后来又生育了3个孩子，由英国助产士接生。^[19]如同历史学者艾伦·迈恩（Alan Mayne）所说：“华人是金矿区活跃的参与者，与欧洲人之间同时存在着合作、共识与争吵、排斥，他们既是竞争者，也是能分享牛奶和愉快闲聊的邻居。”这些研究借助于家庭档案记录，如出生、死亡、结婚证明文件等，追寻华人女性的生活轨迹。更具象地将这一被遗忘的群体呈现出来，特别强调对华人女性个体体验的关注，即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工等的个人感受，以及她们对于19世纪澳洲华人社区的重要性。尽管澳洲华人女性人数远远少于男性，但并不能因此将她们一笔抹掉，她们同样构成了历史复杂性的一部分。

2. 跨种族交往的白人女性

在殖民地传统观念中，华人和欧洲人之间存在着巨大而不可逾越的界限，不仅仅是基于种族、生理因素，更是由于文化、语言以及生活习性等的深刻差异。不少学者注意到，对种族混合的恐惧使得殖民地时期的白人主流社会对华人以及跨种族交往持有非常负面的刻板成见，即认为华人男性由于缺乏家庭生活，导致普遍的道德堕落，只有同样贫穷、堕落的白人女性才会选择与他们结合，而鸦片就是华人结交和诱骗白人女性的主要工具。^[20]

随着家庭史、生活史资料的大量发掘，与华人结合的白人女性群体开始被研究者所关注。波琳·鲁尔（Pauline Rule）、黛娜·哈里斯（Dinah Hales）、桑迪·罗布（Sandi Robb）等学者从家庭史视角切入了对澳洲华人的研究。^[21]巴里·麦高文（Barry McGowan）解析了布雷德伍德金矿地四个华人家族发展史，发现其中三个都与欧洲人联姻。基于此，他认为华人与欧洲女性的婚姻并非以往研究中所说的“不道德的稀有之事”，而是更加常见、稳定，并使华人得以成功地融入欧洲白人主流社会，成为种族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华人家族在生活方式上也非常西化，信仰基督教，孩子们就读于当地公立学校，家族成员积极参与教育、慈善活动，死后葬在社区公墓而非华人墓地，与欧洲家族差异很小。^[22]巴格纳尔对维多利亚淘金热中兴起的小镇英迪格（Indigo）的华人盛氏家族（Shing）的研究，主要结合了访谈家族后裔威尔玛·康罗伊（Wilma Conroy）的口述史资料，以及英迪格地方史资料，包括邮局目录中的英迪格店铺记载、官方记录中家族成员出生、死亡、结婚等信息以及地方报纸中的零散报道。威尔玛是华人查尔斯·盛（Charles chin Shing）和“盎格鲁—华人”混血儿杰西·盛（Jessie Shing）的孙女，她详尽地回忆和描述了这个家族在英迪格经营店铺和庙宇的生活场景。^[23]饶有趣味的是，1898年有几份地区报纸都报道了关于19岁的杰西打伤丈夫查尔斯的报道，杰西被告上法庭时称自己当时喝醉了^[24]——这生动呈现了华人男性与白人女性交往的另一重面相，即可怜而非威胁性的形象——同时期悉尼杂志《公告》和《帝国报》上亦有过类似故事，华人男性由于孤独、缺少朋友、不太会说英语，以至于无法控制他们那些孔武有力、缺少教养的白人劳工女性伴侣。^[25]当然也有一部分出生中产以上家庭的白人女子，比如玛格丽特·斯加利特与华人梅光达一见钟情，后来梅光达功成名就，成为著名的富商和华人领袖。玛格丽特在1911年丈夫去世后出版了传记《梅光达的一生》，称“他是一位出色的父亲、丈夫，堪比任何一个白皮肤的人，他甚至做得更好”。^[26]还有报纸以《悉尼的中国人》为题，采访一位白人女性，询问她为什么要嫁给开杂货铺的中国丈夫——“我曾经是一个不开心的妻子、奴隶；是北方最残暴的流氓的拳击袋，在他死后我选择了拿我当‘女皇’一样对待的人，尽管他是异教徒，但是总比挨打强……他是细心仁慈的丈夫”。^[27]1891年新南威尔士皇家委员会举行了关于华人赌博和不道德行为的调查质询，其中也涉及到华人的家庭生活，并为此质询了9位与华人结合的白人女性，其中之一是23岁的女工艾伦（Ellen），她曾未婚先孕，后来到墨尔本打工，认识了38岁的华人蔬菜小贩并同居，她大胆表述了对这位华人伴侣

和目前生活状态的满意,并称打算要正式结婚。在艾伦的生活圈子里还有一些像他们这样的异族伴侣,显示华人小贩并非如以往概念中的形单影只,他们中的很多人拥有妻子、孩子、朋友和社区归属感。^[28]对白人女性和华人男性结合这样一种婚姻形态的研究,打破了以往关于华人家庭的单一维度解读,呈现出更鲜活、生动、复杂的华人家庭生活场景,丰富和补充了以往对于华人移民如何融入澳洲殖民地社会的解读。

除了婚姻、家庭关系之外,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在广泛的社会层面白人女性与华人男性的交往。尽管在殖民地时期,这样的交往不被白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基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实际需要,白人女性和华人男性还是存在交往的空间。比如,唐人街作为华人聚集结散的场所也经常吸引来此工作、购物、休闲的白人;白人家庭的门廊成为走街串巷的华人蔬菜小贩与白人女性日常接触的区域,尽管华人小贩会时常遭遇到羞辱和攻击,比如1881年《图绘悉尼新闻》展示了一个白人女性吼着“滚出去,约翰,你和你的天花”,用长柄扫帚驱赶华人小贩的场景,但通过巴格纳尔称之为“跨越门槛的交往”,^[29]部分白人女性却产生了和主流男性社会完全不同的对于华人的认知。她们看到了中国小贩的诚实、耐心、可信、干净,同时能够记住顾客的喜好,等等,而且相比于欧洲蔬菜商,中国小贩的蔬菜更价廉物美,这让白人家庭主妇会逐渐对中国小贩产生信任和好感,这样的情感完全是从实际生活中自然产生出来的,而非《公告》等媒体所说的被华人“诱骗”的结果。

1888年,一封写给《公告》的信展示了一个普通的劳工阶层家庭主妇对“华人问题”的态度,她的丈夫是一个反华联盟的成员,正在参与推进一个抵制华人蔬菜的运动,然而她发现白人卖的蔬菜要比华人贵三倍,而这些蔬菜其实也是从华人那里买来的,所以她认为这种抵制毫无意义。^[30]诚如1890年一位来澳大利亚度假的英国人所说:“如果妇女有选举权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就不会有任何对华人入境的限制,她们眼中中国人是忠诚、勤劳的管家;懂礼貌、诚实的蔬菜贩子。”^[31]巴格纳尔的研究在一些非学术性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1896年,玛格丽特·艾格顿(Margaret Egerton)在《宇宙杂志》发表的半自传连载小说,讲述了白人医生妻子安妮由于对语言有浓厚兴趣,参加教堂的语言班,学习广东话,同时也教授一群中国人学英语,其中有个60岁的中国蔬菜小贩刘阿新(Ah Yoo Sin),八年来安妮一直从他那里买蔬菜,两人会互赠礼物,相互关心,形成了一段超越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纯洁温暖的友谊,显示出白人女性和中国男性的交往,并非一定是与性有关以及会带来危险的,^[32]更多是出于华人男性和白人女性的个人选择,包括经济因素、个体安全、寻求陪伴、爱情、相互安慰等,其中包含着大量复杂、微妙、相互矛盾的人性故事,这样的研究路径打破了以往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刻板成见,丰富了华人生活史研究。

三、结语:建构华人移民的跨国研究框架和多元叙事

女性史是澳洲华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澳大利亚学界对19世纪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受制于史料的单一匮乏和研究视角的殖民主义和男性主义偏见,存在着很多的缺失和误读。而以往中国学界对澳洲华人史的研究,则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框架下展开,聚焦于华人职业、商业、政治意识、民族意识、华人社团等领域,^[33]存在粗线条、宏观化、视角单一的缺陷。近年来,国内一些从事澳大利亚史研究和华侨华人史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到澳洲华人史中家庭生活的缺失、女性声音的缺失等,比如乔瑜从白人女性的视角解读19世纪澳大利亚华人男性形象,改变了以往完全由白人中产阶级男性主导的历史叙事,在种族与性别的双重框架下,呈现跨种族交往的个体体验。^[34]总的来看,女性史视角在澳洲华人史研究中尚处在较为边缘的地位,中国学界涉足很少。

毋庸置疑,女性史视角的引入对于深化澳洲华人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打破以往对于跨种族交往的刻板成见,拓宽对于华人婚姻形态、家族谱系、社区建构、文化融入等的研究,同时也揭示在以往澳洲华人家庭生活研究中被忽略的部分,比如多妻(同时在中国和澳洲拥有妻子)、华人移民家庭返回中国以及他们在澳洲出生的子女的命运等等。麦克·威廉姆斯认为,由于中

国家谱遵循的是父系宗族谱系，许多嫁给华人的白人女性从家谱上往往查不到她们的名字，或者是只有轻描淡写的几句简单描述。^[35]而基于语言因素，大多数海外学者直接阅读中文文献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19世纪以广东话书写的中文报纸、文件档案、墓志碑刻等，这恰恰为中国学者介入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未来，可以尝试将中国已有深厚研究基础的宗族史研究以及丰富的家谱资源与澳大利亚史料相结合，广泛吸纳包括人类学田野调查、访谈、视觉文化研究等，建立起华人移民家族的跨国研究框架，将女性史更好地融入华人移民通史研究之中。

〔注释〕

- [1] 王省吾：《十九世纪下半期华工在澳洲淘金谋生事略》，《蒋慰堂先生九秩荣庆论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第198页。其所引述的资料来源于《悉尼先驱晨报》1848年10月3日对“宁罗号”进入悉尼港的报道。
- [2] Charles A. Price, *The Great White Walls Are Built*,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74, p.277.
- [3] Charles H. Wickens, *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No. 18, Melbourne: Government Printer, 1925, pp.952-953.
- [4] Jennifer Ting, “Bachelor Society: Deviant Heterosexuality and Asian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Privileging Positions: The Sites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Bill, 1858”, *Journal of the New South Wales Legislative Council*, Vol.3, 1858.
- [6] Rev. J. W. Young,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Victoria (1868)”, in *the Chinese in Victoria: Official Reports and Documents*, Ian F. McLaren (eds.), Ascot Vale, Victoria: Red Rooster Press, 1985, pp. 31-57.
- [7] Paul C. P.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50-271.
- [8] 早期澳洲殖民者对中国人的态度以及对“华人问题”的阐释，具体可参见一些学者的研究，包括：Ann Curthoys, “Race and Ethnicity: A Study of the Response of British Colonists to Aborigines, Chinese and Non-British Europeans in New South Wales, 1856-1881”, PhD.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1973; Alan Dwight, “The Chinese in New South Wales Lawcourts 1848-1854”,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Vol. 73, No. 2 (October 1987), pp. 75-93; J. M. Graham, “‘A Danger That No Language Could Magnify’: The Newcastle Morning Herald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ustralian Historical Society*, Vol. 69, No. 4 (March 1984), pp.239-250.
- [9] “The Progress of Mongolian Colonisation”, *Sydney Morning Herald*, 8 January 1896.
- [10] [澳] 艾瑞克·罗斯著，张威译：《澳大利亚华人史（1880—1888）》，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 [11] Michael Williams, “Chinese Settlement in NSW: A Thematic History”, *Report for the NSW Heritage Office*, Parramatta: NSW Heritage Office, 1999, p. 59.
- [12] 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妇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研究的新发展》，《妇女研究论丛》2015年第5期。
- [13] Morag Loh, “Celebrating Survival- An Overview, 1856—1986”, Christine Ramsey, “Mostly Celebration- A Student Who Stayed”, in *Survival and Celebration: An Insight into the Lives of Chinese Immigrant Women, European Women Married to Chinese and their Female Children in Australia from 1856 to 1986*, M. Loh and C. Ramsey (eds.), Melbourne: Self-Published, 1986.
- [14] Barry McGowan & Clare Wright, “Braidwood’s Enduring Chinese Heritage”, *Historic Environment*, Vol. 23, No. 3 (2011), pp. 34-39.
- [15] Christine Ramsey, “Mostly Celebration- A Student Who Stayed”, K. Liow, “Ten Years of Adaptation in Melbourne, 1976-1986”, I. Moss, “Chinese or Australian? Growing Up Chinese in a Bicultural Twilight Zone from the 1950s on”, in *Survival and Celebration*.
- [16] S. Couchman, “‘Oh I Would Like to See Maggie Moore Again!’: Selected Women of Melbourne’s Chinatown”, in

- After the Rush: Regulation, Participation and Chinese Communities in Australia 1860—1940*, S. Couchman, J. Fitzgerald and P. Macgregor (eds.), Melbourne: Otherland Press, 2004.
- [17] Clare Wright, *The Forgotten Rebels of Eureka*, Melbourne: Text Publishing, 2013.
- [18] G. A. Pfeffer, *If They Don't Bring Their Women Here: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before Exclus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 24.
- [19] Kate Bagnall, “‘To his home at Jembaicumbene’: Women’s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on a Colonial Goldfield”, in *Migrant Cross-Cultural Encount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56–75.
- [20] Ann Curthoys, “Race and Ethnicity: A Study of the Response of British Colonists to Aborigines, Chinese and Non-British Europeans in New South Wales, 1856—1881”, PhD.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1973; Kathryn Cronin, *Colonial Casualties: Chinese in Early Victoria*,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2; Andrew Markus, *Fear and Hatred: Purifying Australia and California 1850—1901*, Sydney: Hale & Iremonger, 1979.
- [21] Pauline Rule, “A Tale of Three Sisters: Australian-Chinese Marriages in Colonial Victoria”, in *Chinese in Oceania*, Kee Pookong (eds.), Melbourn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and Their Descendants in Australasia and the Pacific Islands, Chinese Museum and Victor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entre for Asia-Pacific Studies, 2002; Dinah Hales, “Local Histories: Chinese-European Families of Central Western New South Wales, 1850–80”, *Journal of Australian Colonial History*, Vol.6 (2004), pp. 93–112; Sandi Robb, “Myths, Lies and Invisible Lives: European Women and Chinese Men in North Queensland”, *Lilith*, Vol. 12 (2003), pp. 95–109.
- [22] Barry McGowan, “From Fraternities to Famili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fe in the Braidwood District of New South Wales, 1850s—1890s”,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 2 (2008), pp. 4–33.
- [23] Kate Bagnall, “Landscapes of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digo and Shek Quey Lee”, *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Vol. 6 (2013), pp. 7–24.
- [24] “Intercolonial Telegrams: From Melbourne Papers”, *Mercury* (*Hobart*), 2 April 1898; also “General News”, *Camperdown Chronicle* (*Launceston*), 2 April 1898.
- [25] “Pin Lung’s Missus”, *Bulletin*, 21 December 1889; *the Empire* (*Sydney*), 30 May 1861.
- [26] Margaret Tart, *The Life of Quong Tart*,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Library, 1911, p.167.
- [27] H. F. Wickham, “China in Sydney”, *Red Funnel*, Vol. 3, No. 1 (August 1906) .
- [28]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lleged Chinese Gambling and Immorality and Charges of Bribery against Members of the Police Force”, *NSW Legislative Assembly, Votes and Proceedings*, 1891, pp. 398–401.
- [29] Kate Bagnall. “Across the Threshold: White Women and Chinese Hawkers in the White Colonial Imaginary”, *Hecate*, Vol.28 No. 2 (2002), pp. 9–32.
- [30] “The Chinese Hawker”, *Bulletin*, 16 June 1888.
- [31] Ewing Ritchie, *An Australian Ramble or A Summer in Australia*, London: Stubbe Press, 2004, p. 181.
- [32] Margaret Egerton, “My Chinese”, *Cosmos Magazine*, Vol. 3, No.3, 19 September 1896, pp. 124–128; Vol. 3, No. 4, 19 October 1896, pp. 138–141; Vol. 3, No. 5, 19 November 1896, pp. 192–196.
- [33] 主要著作参见：雷镇宇：《澳洲华侨概况》，台北：中华书局，1953年；司徒泽波、陈本健：《斐济国、所罗门群岛、西萨摩亚群岛华侨概况》，台北：中华书局，1953年；刘渭平：《澳洲华侨史话》，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6年；刘达人：《澳洲与中国》，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7年；张秋生：《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黄昆章：《澳大利亚华侨华人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34] 乔瑜：《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澳大利亚女性眼中的华人男性形象》，《历史教学》2012年第2期。
- [35] Michael Williams, “Destination Qiaoxiang: Pearl River Delta Villages and Pacific Ports, 1849–1949”,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2, p.78.

[责任编辑：乔印伟]